

[扶輪訪談]



VIKTOR MILLER GA USA

雅禮士·科特羅維茨

無論你住在何處、有什麼樣的經濟狀況或創傷史，
我們都是鄰居，這位對社會不平衡明察秋毫的觀察者如此堅持。

雅禮士·科特羅維茨 ALEX KOTLOWITZ 是一位專門研究不平等的學者。作為西北大學的駐校作家，他的職業生涯一直在調查和報導美國那些最貧窮的社區。在這一過程中，他已顯示給我們看，貧窮不僅僅是缺錢而已。貧窮也是指缺乏安全和機會，而且往往也是指缺乏希望。

科特羅維茨在他的新書《美國的夏天：芝加哥的愛情和死亡 An American Summer: Love and Death in Chicago》中，科特羅維茨講述了一些人被城市暴力改變的故事。有一個高中生懇求另一個少年不要開槍打他最好的朋友；有個母親原諒殺害兒子的兇手，因為「他也在黑暗的地方迷路了」。科特羅維茨提醒我們，無論我們住在哪裡，這些男男女女都是我們的鄰居。「他們是人，」他說，「就像你和我一樣。」

科特羅維茨寫過四本書，其中包括《這裡沒有孩子 There Are No Children Here》，紐約公共圖書館將它列為 20 世紀最重要的書籍之一；它被改編成由奧普拉·溫弗瑞 Oprah Winfrey 製作和主演的電視影片。他是獲獎紀錄片《中斷者 The Interrupters》的製片人，該紀錄片是根據他為《紐約時報雜誌》撰寫的文章拍攝的。他獲得的榮譽包括兩個皮博迪獎、甘迺迪新聞獎，以及約翰·拉·法吉 John La Farge 種族間正義紀念獎，以及八個榮譽學位。他之前在國際扶輪英文月刊的作品包括 2012

年的文章「緩和暴力 Defusing Violence」和 2011 年一篇關於美國貧窮問題的文章。

最近，科特羅維茨在伊利諾州橡樹園家中與經常投稿《國際扶輪英文月刊》的雪麗·史帝芬森 Shirley Stephenson 坐下來聊。作為一名作家和詩人，史帝芬森是芝加哥西區一個校內保健中心的家醫科護理醫師。在那裡，她與可能已經走出《美國的夏天》頁面的青少年一起工作。

和科特羅維茨一樣，史帝芬森也嘗過暴力及其後果。「我曾經在急診室工作，多年來我一直聽說芝加哥的暴力事件，」她說。「但是當你經歷過親身看到一輛汽車剛剛被擊中，你將車中的孩子們帶出來時，你會對暴力有不同的體驗。」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當你看一個社區時，你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什麼？

科特羅維茨：是否有任何活動。不管在街上的人還是在門廊上的人，是否他們都認為這社區是屬於他們的。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我們如何知道我們的社區是什麼樣子？我們天生關心我們的社區嗎？

科特羅維茨：這是美國現況的一大矛盾：儘管我們多麼稱頌這個國家的多樣性，以及我們多麼願意認為我們都在一起，但我們過著如此互不相干的生活，這讓我感到驚訝。我們最終定居在我

們熟悉的人們的地方，周圍都是長得像我們的人和穿得像我們的人。我們必須認清這一矛盾，並找到解決之道。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你的書描繪了受暴力和貧窮所困擾的芝加哥社區。這對生活在那裡的人有什麼影響？

科特羅維茨：幾年前，我去了芝加哥以南約 140 英里的丹維爾矯正中心（一個中等安全措施的監獄）參加《中斷者》放映會。後來，我和兩個囚犯談過。其中一人在監獄裡待了 18 年，另一人待了 21 年。他們都來自電影中的一個恩格爾伍德 Englewood 社區，看到自從他們離開監獄以來社區變得那麼糟糕，他們非常傷心難過。

這些社區缺乏機會。你去那裡待一段時間，就能很明顯看出競爭環境並不公平。你走出你在恩格爾伍德的家，便能看到閃閃發光的市中心天際線，知道什麼不是你的。這確實累積了一種怨恨感。我想，在美國的大部分地區，你很容易看到我在《美國的夏天》中寫的社區，然後你會想，「那又怎樣，那又不是我」。所以這是我對這本書的期許之一：人們會閱讀這些故事，在我寫的人身上看到自己。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你認為人天生就有同理心嗎？

科特羅維茨：同理心是我們之所以為人類的核心。我稱之為敘述

故事的向心力。它也是社區的向心力：它把我們團結在一起；它把我們綁在一起。它是我們作為人類的一部分，但它需要我們付出一些努力。這並不是說我們自然傾向於設身處地想去想別人。這需要跳躍的想像力。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當你在其他社區時，可能擺脫你個人生活中累積的經驗和觀點嗎？

科特羅維茨：我告訴我的學生，作為新聞工作者和記者，我們必須培養自我了解。我們必須知道我們的個人和集體經驗，以及這些經驗如何影響我們對世界的看法。我們談論的是我的專業的客觀性，但實際上並沒有這種事。我們不是空白的，所以當我們報導一件事時，我們最應該要求自己的是，我們對所看到和聽到的內容絕對誠實和公正，而且我們願意接受別人挑戰我們的假設，並允許自己被打倒。唯一可能讓那種情況發生的方法是你知道到那一刻為止你帶來的一切。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有些孩子可以奢侈地問：「我長大後想做什麼？」《美國的夏天》裡的孩子們會問這個問題嗎？

科特羅維茨：在這裡沒有孩子，我問一個男孩長大後想做什麼。他說，「如果我長大，我想當公車司機。」他用的是「如果」，不是「當」。當然，協助我寫那本書和這本書時合作的那些年輕人有一種感覺，那就是未來真的很不確定。你沒有明天——這

對於一個年輕人來說一定是很可怕的。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創傷後倖存的人有信心恢復正常生活嗎？

科特羅維茨：創傷，特別是我在這本書中寫的那種創傷——暴力行為、失去家人或朋友，或者你自己是暴力受害者或罪犯——毫無疑問，它會深入你的骨髓。它把你塑造成某種形狀，你會積極地反抗，來阻止它困住你。你在書中寫的人身上看到了這一點，你也在從戰鬥中回來的老兵身上看到這一點。這並不是說他們已經把創傷拋在腦後，但大多數人都在人生旅途上繼續前進，過著充實而豐富的生活。但是，這一刻永遠不會消失，特別是如果你失去了一個親人。你不希望那一刻消失；你不想忘記那個人。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寫《美國的夏天》對你的影響是否與寫《這裡沒有孩子》不同？

科特羅維茨：我記得當我第一次開始花時間在這些專案上並同時報導《這裡沒有孩子》的情形。工作條件惡劣得令人可怕，以前沒遇過這種情況。我感到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羞恥感：我怎麼會不知道竟然有這些情況呢？那時我在芝加哥市中心工作，這些專案離我的辦公室只有2英里。我想，「我怎麼能這麼近，卻一點概念都沒有？」最終，我的羞恥感變成了憤怒，在這個世界上最繁榮的國家，我們竟然會有如此之深的痛苦，如此之慘的貧窮。

出版了《美國的夏天》之後，那種貧窮對我來說顯然並不陌生。創傷來自與人們談論他們生活中最令人不安、最令人擔憂、最悲傷的時刻。他們的日子真的很苦。你聽說過那些與受過創傷的人一起工作的人所遭受的「二次創傷」。我在書中提到的兩位社會工作者安妮塔·斯圖爾特 Anita Stewart 和克里斯特·史密斯 Crystal Smith 都遭遇過這種二次創傷，毫無疑問，當我在寫這本書時，我也經歷過。我仍然在某些方面感受到這種絕望和深深的悲傷。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根據你在芝加哥街頭的經歷，你認為恢復能力能作為治癒絕望的良藥嗎？

科特羅維茨：我們需要注意我們如何談論恢復能力。有時候我們會以一種油嘴滑舌或輕率的方式去談論它，特別是兒童的恢復能力。但是在我的書中，我講述了艾迪·博卡內格拉 Eddie Bocanegra 的故事，他在18歲的時候為了報仇而開槍打死人。他在獄中度過了14年。艾迪是個了不起的人，他的故事的主題是他如何找出辦法來原諒自己所做的一切。今天，他就在芝加哥這裡做一些最重要、最有創意、原創的關於預防暴力的工作。

但在他的故事中，他的夢想曾在某一刻讓他感到不安。他的妻子是一名社會工作者，她告訴他，這是恢復能力的代價。她說，恢復能力不是一個靜態的概念；你必須不斷努力。恢復能

力並不是指我們有一種天生的堅毅來克服深刻的創傷時刻。我們必須不斷努力。因此對於認為只要振作起來就會有恢復能力的概念，我要小心謹慎。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如果人們覺得暴力並沒影響他們，我們如何使他們參與尋找解決辦法？

科特羅維茨：我在書中設法去提醒我的讀者，我報導的人是我們的鄰居。重要的是，不僅要和他們聯繫，還要關心他們的困境。也許這是天真的，但我相信，我們有能力關心自己的生活以外的人，關心所有我們熟悉以外的東西。

我敘述這些故事是出自於「生活應該是公平的」這個基本信念，然而我經常發現自己處在這個國家的某些角落，那裡的生活根本不公平。套用斯徒德·特克爾 Stud Terkel 的話說，如果社區不好，我也不好，這也是我敘述這些故事的部分原因。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扶輪社員是人道主義者。他們有同理心，他們也是行動者。他們想採取行動。您是否可以向扶輪社員提議一些可以解決貧窮和暴力問題的介入方法或行動？

科特羅維茨：像扶輪這樣的組織的一個偉大之處在於它有一個非常強大的集體聲音。更重要的是，扶輪社員在富裕與貧窮這兩個世界都有一席之地。許多扶輪社員的生活可能相當舒適，但

他們卻在世界各地不一樣且陌生的社區工作。重要的是，他們要講的是他們花時間在哪些人身上的故事。對於不是公共話題經常出現的問題，他們可以發出強有力的聲音。我們這些有一定地位的人義不容辭應該努力確保這些問題成為公共和政治討論的一部分。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在 2012 年為《國際扶輪英文月刊》撰寫的《消除暴力》這篇文章中，你建議人人都需要一個不放棄他們的人，一個以尊嚴和正派的態度對待他們的人，一個永遠不會知難而退的人。對很多人來說這是巨大的承諾。有中間地帶嗎？

科特羅維茨：有些機構致力於此類工作，我們義不容辭應支持這些工作。其中一個地方是公立學校。儘管人們都在談論學校多麼功能不彰，但它們是孩子們真正想去的地方。然而我們有克里斯特·史密斯和安妮塔·斯圖爾特這兩個不尋常的例子，這兩位社會工作者擁抱了所有這些需要培育及支持的孩子，這不僅是一種比喻，實際上也是如此。你可以在艾迪·博卡內格拉在執行的「芝加哥迅速雇用及發展倡議 Readi Chicago」計畫中看到，他們在那裡為年輕人提供工作和認知行為療法。或者你會在「男孩和女孩慈善之家 Mercy Home for Boys and Girls」看到這一點，這是芝加哥的一顆寶石，它幫助了像馬塞洛·桑切斯 Marcelo Sanchez 這樣的孩

子，我在書中講述的另一個年輕人的故事。還有「停火 Cease Fire」，現在被稱為「治療暴力 Cure Violence」，其工作在《中斷者》中亮相。這些行動對於個人而言可能是過於巨大，但是要走出去，支持正在這樣做並且做得好的機構。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你是受到什麼的激勵而去從事你畢生的工作？

科特羅維茨：我大學時輟學了一段時間，最後在亞特蘭大的一個睦鄰之家裡工作。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我們城市的深度貧困。對我來說，這是改變我的一刻。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你在做你一直想做的事嗎？

科特羅維茨：直到我在大學畢業後找到一份小型另類新聞週刊的工作，我才發現到這是我想做的。它促使我去了我原本不會花時間去待的地方，去認識我從來沒有理由去認識的人。一旦我發現我是那麼喜歡它，我想，「這就是我想要做的。」我便窩在家裡的辦公室裡寫作。就在這時，我覺得自己是活著的：當我講故事的時候。

促進和平是扶輪的六大焦點領域之一。請至 rotary.org/our-causes 進一步了解。